

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出版

党内交通史料选编

第二辑

(内部读物)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

目 录

地下交通站.....	马青华 (1)
抗日战争中残酷环境时期的党内交通	张子荣 (8)
冀中抗日根据地九分区地下交通工作	辛以勤 (20)
一夜行	郭建章 (29)
为党传递信件的地下鸿雁 ——记地下交通员刘金昆.....	南官县委办公室 (36)
坚持敌后搞交通	周泽兰 (41)
战斗在冀中交通线上	韩步平 (46)
送情报	周 正 (51)
我到延安执行的一次交通任务	李宪珠 (54)
一场特殊战斗	马 赛 口述 王省三 整理 (63)
智斗顽敌	马 赛 口述 王省三 整理 (72)
三下太行跑交通	张志明 (79)
战斗的里程 ——忆党的交通工作.....	李志华 (84)
送军需	王言炳 (89)

抗日时期山东的党内交通工作的回忆	任兆祥 (92)
鲁南铁道游击队开展武装交通工作的情况	原山东省委交通科供稿 (107)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清西地区党内交通情况	李晓民 (114)
丹心为人民 铁脚跑交通	重庆市电信局宣传科 (118)
送少奇同志去晋冀鲁豫边区	白焕文 口述 田解卿 整理 (126)
地下交通	周晓华 戚原 贺崇寅 (131)
五福星酒店	徐玉英 口述 谢建平 吴德国 程培基整理 (143)
五港交通站	陆广祯 (146)
地下交通员札记	曹达 (162)
离开上海到苏中跑交通	樊正明 (174)
回忆新四军上海办事处	张达平 (181)
有关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一些情况	李子明 (190)
交通工作十年	顾敏 (194)
抗日时期的四明交通总站	翁惠珍 (203)
从南平到崇安	陈冰 (207)
忠诚党的事业 完成党的任务	袁金明 (212)
走交通	钟子恕 回忆 骆啸声 赵熙文 整理 (214)

我做党内交通工作的二三事	冯仁甫 (227)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担任党内秘密交通的情况	曾昌明 (230)
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南委事件的经过	张 克 (236)
“霍荣记”联络站	霍理文 (240)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汕头市党内交通	郑礼华 (249)
在敌人心脏里闹革命 ——回忆我在陕甘宁边区搞地下交通的情况	马应海 (252)
忆地下交通	王生春 (263)
陕西地下党交通工作	孙生贤 (284)
随机应变 沉着应敌	赵乃鼎 (288)
战斗在国际交通线上	杨宝山 口述 高秀峰整理 (293)
难忘的中蒙交通线	林 廷 口述 郭旭明 整理 (306)
在秘密交通线上工作	郭申振 (313)
我党机体上的大动脉——党内交通	师 哲 (316)
记一次护送任务	张凤歧 (321)

地下交通站

马 青 华

西安事变以前，华北党的工作完全处于地下。当时国民党河北省省长宋哲元是反对共产党的急先锋。他把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子全编入了壮丁组织。宋哲元的反动政治口号是：“训练壮丁政策，防共反共灭共保家乡，宁错杀一千人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更是惨无人道，勾结宋哲元一起防共反共灭共。我家住在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处的赞皇县，两省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来威胁恫吓。党的工作完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党的地下组织，通讯来往联系十分困难，稍有不慎就有断送性命的危险。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拥护党的革命事业，觉悟了的劳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与敌人展开了公开的、秘密的斗争。

母子交通站

我母亲郝任贤（乳名“任任”）1930年由傅贯一同志（当时在中共河北省工委特委）介绍入党搞地下工作。入党前我就跟母亲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当时我只十几岁，在母亲的训导下成长。她常给我讲梁山英雄好汉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故事启发我。我恨不得也到梁山去和他们一起除暴安良，打倒国民党，推翻伪省政府的残酷统治。母亲说：梁山好汉是古代的人物。当今

的英雄好汉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劳动民众的救星。我从小家境贫苦，上不起学念不起书。想学武术又无师傅，只好自练摔跤。自幼爱劳动，农忙时田间劳动，冬春榨油打油，练就了一付强壮的身体。在村内和同年人组织抱平团，仿梁山好汉抱打不平，除暴安良（暗地拥共搞穷人会）。1936年我村小学教员李绪春看中了我，他是共产党赞皇县工委委员。经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十七岁。虽然我母子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但我们并不属于一条线联系的。党的组织处于秘密，对家中亲友、父母、妻子也不准讲。组织上没有横的关系。但目的、任务都是一致的。

“七七”事变前，母亲就做地下交通站工作，当时我不知道，只是见家中有时来往生人多。我问母亲他们是谁，母亲说这都是你干叔，有的是舅舅。虽然这么说，我心里总觉得奇怪。有一次来了一个看病的医生，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提着药箱。到家后问我母亲：“吃药见轻吗？”母亲说：“灵丹妙方，妙手回春，谢谢医生，还有其它病请医治。”我心中纳闷，母亲有什么病呀！但不敢问。医生在我家吃午饭时边吃边说：县衙门要更换新斗新秤，老百姓哪里有钱买新斗新秤呢？某月某日去县衙门找县官请求不换新斗新秤。要多去人，人多力量大，大众团结一致，会迫使县官答应的。医生走后，有人说他是吕庄村的“十和尚”（即傅贯一，“十和尚”是他的乳名）。群众不知道他的底细，我连“十和尚”这个名也不知道。母亲让我到南羊角村和竹山村亲戚家传说此事。我姑夫问：“玉更（我的曾用名），最近十和尚到你家没有？”我说：“这话就是和尚伯伯讲的，母亲不让给别人讲。”回家后我问母亲：“十和尚”是哪个庙里的？为什么行医卖药？母亲说：“你这个傻孩子，十伯伯名叫和尚，不是出家的和尚。”过了些日子，赞皇县闻名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初一砸衙门，和“三·七”“农民暴动”，抗度量衡运动按照原计划进行了。这次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党领

导的群众运动显示了威力。事后“十和尚”在我家躲藏了两天就走了，谁也不知去向，听说他参加了瑞金会议。

“七七事变”后，傅贯一同志知道了我是中共党员。他对我说：“玉更，我们带部队到山西去接八路军，你留在地方与你母亲搞地方交通站工作，任务你母亲知道。”新的联络关系是：东边是城内的李绪春，西边是黄北坪药铺刘祥贤。规定了三个字的代号，第一个“任”字代表联络站负责人；第二个“×”字代表被介绍的人（即交通员）；第三个“贯”字代表傅贯一同志。即“任×贯”。之后，傅贯一走了，去了山西。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傅贯一同志回来了，但未见到他。有一天，大约在1937年11月某日，有人到孟家庄打问马玉更家。到家后那人问：“这是马玉更家吗？”母亲说“正是，你找他干啥有事吗？”那人说：“你是任大娘吧？”答：“是玉更娘。”此人拿出一个纸条，上写着：“任郭邓贯”四个字。来说：“我姓郭，要你们把纸球交给邓（八路军129师骑兵团邓勇跃政委），因为我往西去人生地不熟，你们去送交吧！越快越好。”他吃过饭就走了。母亲派我去送纸球信，我二话没说拿上纸球就去了，亲自交给了骑兵团邓政委。隔了两三天，129师骑兵团到达孟家庄村夜晚就住在这里，与城里敌人相距只5公里。母亲动员群众组织战地救国委员会（“村政权”），按上级指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征收粮草保证军需，满足部队食用。第二天见到了傅贯一和邓政委。傅让我扮成串亲戚的样子，到距我村二里路的严华寺村打听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到了目的地，很快从我们的人那里了解到所需要的情况，向傅贯一同志作了汇报。第三天早晨，驻严华寺村的土匪军300人在前边走，骑兵团从孟家庄动身在后边跟。到了赞皇城南30多华里的院头村镇，在那里与土匪军和谈无效，第三天早晨全部歼灭了匪军，为民除了害，人人拍手称快，同声赞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救星。

1937年12月组织上把我调到太行独立支队司令部担任交通

员。司令员桂干生，政委彭涛（建国后任化工部长），秘书长傅贵一同志（建国后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兼法院院长）。有一次司令员派我到元氏县政府（驻南佐镇）去了解土匪头目王三和茄八下落，以及他们的人数、装备、活动等情况。接受任务后，上级配给我骡子一匹，日本式手枪一枝，一路很顺利到达目的地。见到县长姜纪武，秘书武宣声同志（现任河南省副省长），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把上级的指示报告他们后，他们连夜去调查敌情，第二天清晨把写好的情报用蜡封好交给我，还有二千元现款。中午时分，返回到元氏县和赞皇县交界处的白垆村，遇上国民党军队牛老道团。他们把我抓到团部查问。在这之前我已经把蜡丸吞进肚子里。在那里正好碰上了当年训练壮丁的班长李永富，他在牛团长手下当副官，我急中生智借势认了这个多年没见过的班长。我上去和他攀谈，以便借势脱身。当时牛团长搞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便把我交给他处理，并暗示将我干掉，企图得一匹骑骡和千元现款。李副官同我到街上饭馆共吃午饭，我主动请他。下午两点我要动身走，他不让，说：“兄弟多年不见，多玩一会儿吧，走早了碰上日本人就没了命了，路上危险。”我心中有数，知道其中有鬼，说不定他们拖延时间，以便趁天黑后下手。一直拖到快四点了才放我走，并给我指定路线：向正西方走北盘村、北水峪村到许亭再向南去才保险。我识破他们的诡计，嘴上满口答应并一再表示感谢。我让李副官送我出村，通过了岗哨，说了些客气话，我们就分手了。我骑上骡子回头一看，李副官象个醉鬼东倒西歪往回走，走的速度还挺快。我又叫回他说了几句客套话，目的是拖住他，并趁机把骡子的肚带勒紧，以免误事。李副官与我分手后报告牛团长。牛团长下令骑兵按他们指定的路线追击，看见就开枪，要死的不要活的，把骡子牵回、现款带回领赏。我呢？与李副官分手后只向西走了一华里便抄路向南飞奔野草湾、黄北坪司令部，当晚给司令员干桂生、政委彭涛同志汇报了敌情和路上的遭遇经过，受到

了上级的表扬。过了几天，八路军129师385旅陈锡联的部队全歼王三和茄八土匪近400人，为民除了害，扫除了我抗日工作上的障碍，真是大快人心。

1938年3月我参加了反扫荡，粉碎敌人分九路向我太行总司令部的进攻。战斗胜利结束后，党派我到赞皇县八路军工作团中区分团工作(全部是敌占区)，那时强调干部地方化，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下交通情报宣传站，实际是中区区委书记，名义上是新华日报售报员，送报的交通员。回后协助母亲做地下交通站工作。在193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有一个操南方口音的人，到我家问：“这是马玉更家吗？”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南边的临城，姓陈。”对上暗号后，他从烟斗内掏出一个纸条，上写着三个字“任陈贯”。母亲见后说：“到西屋去谈。”陈问了城内日本人的情况。母亲说：“城内日本人不轻易出动，一旦出动，情报很快就会传来送去。当前的情况是，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13支队破坏统一战线，不打日本鬼子，而杀害我抗日政府人员和八路军及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发现稍有口音不对，就按奸细分子杀害，十分猖狂，我们地下工作人员要百倍警惕。到我们家你可以放心，但不要出门，有什么事我们去办理。”陈同志说：“我要到路北有事。”我母亲说：“你很疲劳，在这儿住几天恢复一下再走。”陈说：“任务紧急不能久住，明天就动身。”第二天正好是许亭过集，备好扁担和筐子，我和陈同志打扮成卖山货的人，临行前母亲给陈5元钱，让他路上用。陈执意不收，母亲硬塞给了他，他非常感激。因为沿村住的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队13支队，我们不走大道和村庄，穿山越岭走农田小路。我送他20多华里，过了三陈村才回来。两天后，国民党13支队司令部派两个特务到我家查问此事。母亲坦然地答道：“玉更城关的舅舅要到许亭镇买些山货，山货没买成，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信可到城关去查问。”母亲又假装生气地说：“回去告诉你们司令员‘曼妮’，就说少

找她姨母点麻烦！”两个狗特务吓坏了。原来我的母亲是于司令员的姨母。母亲不提于司令员，张口“曼妮”（于的乳名）看来派头不小。母亲问：“是于司令员派你们来的吗？”两个狗特务崔连生、韩增增齐声道歉，说是误会。母亲顺情说道：“不知道的话就不能怪罪了。”把两个狗特务训走了。过了两天又来了13支队几个扛枪的家伙到我家张牙舞爪又是一番恫吓。母亲毫不畏惧，说：“你们又来了，这事不要问我，去问你们司令员‘曼妮’去吧，他派崔连生、韩增增来问过了，都讲清了。”这几个家伙看母亲的口气挺大，也有几分惧色，于是没再多问就走了。母亲就这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巧计骗过敌人，掩护同志。受到当地群众和上级组织的好评，人人称赞母亲是智勇双全，忠心耿耿的女共产党员。

1939年赞皇县三月政变，这时敌13支队派一个营到孟家庄截住中区抗日政府的去路。并去祁家庄、梁家湾、陡岑三个村抄抓中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得知13支队一个营来孟家庄村之前，中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全部分散安排到孟家庄村的各家各户，并入了户口。这是母亲他们安排的。吃饭问题母亲交给了党员支委抗日村长李明山同志负责。一切就绪后，13支队来了一个营也住在孟家庄村，曾到郭家庄、梁家湾、陡岑抓中区工作人员多次，一个人也没有抓住。母亲把顽军营长秦玉顺请到家里进行谈话。母亲说：“玉顺，你当了营长可还是我的外甥，我是你的舅母。”玉顺说：“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舅母，我是你的外甥。”母亲说：“那就好，不是六亲不认，我正想和你谈谈。如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同心同德抗日救国才是大仁大义。可国民党与共产党不诚心合作，老是争权夺利，结果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人拍手称快，老百姓遭殃。舅母劝你一句话，区政府、八路军、13支队都是三里五乡的人，有的亲连亲，可不要互相残杀，抓人打人。当上官多办好事，不要办坏事，少给父母挣骂。听说你营的连长、排长到中

区常驻的三村，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抓到。他们聪明办事，劝你也不要强抓人。”秦答道：“舅母说的对，不能轻易抓人伤人。不过我们有任务，这是公事。”母亲说：“好吧！如果交不了差，就把你表弟玉更抓去交任务当差事。玉更是中区政府新华日报的销售员。”秦说：“你说到哪里去了，万不能抓表弟去交任务当差事。”母亲说：“如果不抓玉更，那么就不能在孟家庄抓一个人，否则今后舅母不能饶恕。”秦从小对我母亲很敬重，非常崇拜我母亲。这一次真是答应了，说：“舅母放心，我保证不在孟家庄抓一个人。”但是顽军司令部派来的两个特务驻在孟家庄村。狗特务韩增增穷凶极恶地说，县政府已是我们的了，今后你们村如果再给八路军区政府一斤粮食，立刻枪毙。韩增增每天查看村公所的账，企图找出差错。急坏了村长地下党员李明山同志。他是负责供给区政府人员粮食的，万一暴露了，不但个人性命难保，更主要的是我区政府人员的性命安全受到威胁。特务韩增增是个横行霸道、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的反革命分子，群众都恨透了他。个把月后，我八路军主力来到这里，全歼顽军，粉碎了政变事件。狗特务韩增增隐蔽在地下，被我区政府工作人员抓获，当场击毙，大快人心。在这次反顽军政变中，我母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机智地掩护了同志们。可惜她40岁就去世了，全村人都悲痛万分。为了缅怀这位善良、英雄的母亲，全村人联合送了一块合乡匾，上写着“贤孝名高”，这块匾一直挂在我家二门上边。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也没人敢去掉这块匾，只是把匾翻过来写上“为人民服务”。村里人提起我母亲都是赞不绝口。

（河北省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征集）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

抗日战争中残酷环境时 期的党内交通

张 子 荣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芦沟桥炮声隆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武力威逼下，如丧家之犬，节节败退，日寇一举侵占了我辽阔的华北平原，控制了各个城市、铁路干线和交通要道，修筑了一些孤岛似的岗楼和据点。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占领了我们安平县城，然而广大农村仍然是由我们控制着。日寇有时也集中兵力进行扫荡、烧杀和抢掠，但都被我抗日军民所粉碎。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抗日的熊熊烈火很快燃遍了整个华北。冀中平原是晋察冀边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华北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之一，从冀中区、分区、县、小区（中心村）、村，党的各级组织坚决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等。尽管日寇盘踞着一些城市和交通要道，而我们的各级政权以及抗日群众团体都很健全。我们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男女老幼齐动员，有人出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我于一九三八年在本村参加了革命活动，三九年三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公开担任小区治安员、区工会执委、村治安员、县孵鸡厂和糖厂厂长，党内担任支部副书记，负责传递信件等工作。回忆抗战初期的交通工作，党内党外是分开进行的，公开的和秘

密的各有一套通信联络系统，都能正常进行工作，而且是风雨无阻，上呈下达非常及时。信件的具体种类是：（一）党外：十（平信），卅（快信），卅（加急），卅（特急），鸡毛信（火急）。通常在信的背面附条写明传递路线的村名、单位、姓名或是用代号。完全是靠步行接力传递，根据路途远近以步行速度所需用的时间计算等级。如平信每天定时送出，快信和加急不能超过半天，特急和火急则要求快步不停地传送。如果正赶上吃饭，也要放下碗筷立即送出，并要收条。（二）党内：信的种类基本相同，只是传递的方法不同，一律由交通员和党支部派人传送，村名和人名一律用代号，由区交通员送到各中心村（即小区）支部后，再由专人秘密送交各基层支部。有时直接送交本人，有时根据规定放在隐蔽地点。总之，当时的交通工作，都能及时地完成通信联络的任务。

日寇为了进一步统治华北，妄图把冀中地区的抗日烽火压下去，在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和指挥下，纠集了重兵五万余人，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开始对冀中平原发动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拉网清剿”式的“五一”大扫荡。重点是深、武、饶、安、祁（今安国县）、博、蠡等县，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随后，又进行了“掘地三尺、入骨三分、剔抉清剿”的五次强化治安。

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我党的各项工作，被迫完全转入地下，以隐蔽的方式开展各项工作，不管白天黑夜，基本上生活在偏僻的野地里，临时挖一些地窖，有时连续几天不能活动，连吃的饭都是由家人或老乡化装下地、打柴草、挖野菜等方式给送去，生活极端困难。

党的交通工作是在“五一”大扫荡以后，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组织形式、任务和交通联络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适应当时的残酷环境。因此，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首先建立武装交通组织，区委设专职武装交通员。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被调到区担任交通员的，不久又调到县武装交通队工作。区委设交通员的同时，还设半脱产的干事若干人，由区委直接领导。在安平县境内，二、三区（即滹沱河、潞龙河之间）是东西来往的主要干线（当时崔树馨、刘波同志分别担任二、三区的区委书记）。县委成立了武装交通部，部长由县委领导兼任，苏其祥同志任副部长，县武交队归县武装交通部领导，下设三个站，每个站五至七人。记得当初的划分是：西站为总站，有石玉清和张老总任站长；中站有我（当时已被调任中站长，曾化名刘奇、朱旭）；东站有李西庆任站长。武装交通队的任务是：秘密传递党的机密文件、输送秘密物资、护送冀中、分区周围各县、区检查工作和过往干部以及安排他们的食宿等项工作。当时，县委对武装交通人员的选拔也极为慎重，要求政治可靠、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不怕艰苦、埋头苦干，在群众中威信高的人来担任此项工作。因为武装交通队员的任务艰巨，它担负着“五大员”的任务：一是交通员，这是我们的基本工作；二是战斗员，每次出发前都要做好战斗准备工作，遇有情况可随时参加战斗；三是指挥员，我们经常护送各级过往的干部，在遇有情况时，这些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要听从我们的指挥；四是招待员，护送各级干部时自始至终都由我们负责招待；五是炊事员，在特殊情况下，我们还要亲自做饭。之所以选拔极为慎重，是因为倘有不慎，用人不当，出现一个不坚定分子，经受不住考验，所遭受的损失将不堪设想。我们有的地区的干部牺牲，其重要原因，除敌人直接杀害的以外，则是由于队伍内部不纯，出卖同志而被捕牺牲的。但在我县武装交通队中，尚未发生过此类事件。事实证明，县委重视，选拔干部得当，胜利地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任务，应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五一”扫荡之后，我的家便成了过往干部最早中转基地，利用大扫荡前县孵鸡厂在我家挖的为藏鸡蛋用的约有三间屋大小的

地洞，留宿我党过往的各级干部，有时一天能达到三、四十人。那时经常过往的有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妇联的侯大姐，冀中七分区司令员兼地委武装交通部长于权申及其爱人张子辉、地委书记张达及其爱人，冀中区妇联主任白云、地委武装交通部副部长陈宝玉、县委书记张亮、组织部长刘其恒，三区区委书记刘波等同志。我的父亲张老淮（共产党员）白天挖洞晚上放哨、送信。双目接近失明的母亲担负接应同志和盖洞口，还照顾留宿的伤病员，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共产党员）负责烧水做饭。有一次，分区手枪队的孙兆亭同志病重留宿我家时已不省人事，经老母精心照顾了一段时间，身体一恢复便马上归队，以后一直没能见面，直到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经过多方查询，才终于找到了难以忘怀的、当年曾救过他性命的已经双目失明的妈妈。那时，我的家被同志们誉为革命家庭、干部老店。后来由于汉奸张世才的告密（后被我方处决），日伪军曾几次包围我的家，四处挖地找洞口，但地窖却没有受到损失，因为在敌人每次出发之前，当时任维持会长、伪大乡长的王洗新同志（系我党派去的同志）都秘密通知我们，等到敌人来了，我们早已转移了。后来实在无法维持，在县委组织部长刘其恒同志和区委书记刘波同志的指示下，我家这个中转基地，全部转移到村东头的另一住处，避开了敌人的耳目，续继开展这一项工作。

武装交通队要配合各区党政部门向伪方人员进行教育，并利用伪人员开展交通工作。因为在日寇占领初期的伪人员都是群众临时推选的，凡不符合条件、不可靠分子任伪干部的，要进行教育，对通敌告密者以汉奸论处。对个别亲敌告密的，如“铁杆汉奸”和对我方危害大的伪军头目，我们即配合县大队、区小队、县公安局采取“单打一”、“掏老窝”等形式进行坚决地镇压。凡不经我们审查批准的伪干部均为非法的，凡不按上级指示支应敌人的按汉奸论罪。就这样，经过一番整顿，绝大部分伪人员基本上

都被我们控制住了。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县对敌人斗争采取了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两面斗争”的策略，在县、区委均设敌工委员和干事，从事掌握教育伪人员向敌人进行合法的斗争和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伪军。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伪组织的人员都能为我方工作，表面支应敌人，实际是以伪身份作掩护的抗日力量。当日寇“清剿”“剔抉”时，村长用给敌人“主动引路”等办法调虎离山，来掩护我方人员全安转移或隐蔽。我方人员夜间活动时，常常是在巡更人员“平安无事”的喊声中顺利地通过交通线或突袭敌人。我们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也充分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为我方送信、送情报，甚至用这种合法的方式护送我方干部等等。敌人便成了聋子瞎子到处碰壁，致使日寇妄图利用伪军、伪组织巩固它的统治，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无法得逞。

武装交通队的活动方式，一般是夜间行动，穿着灰色的夜行衣（象短雨衣的样子，没有扣子，用两根带子一系），手枪往腰里一插，行踪神秘。事先规定好接头和联络暗号，有时是面对面交换文件，有时也为了避开敌人的监视而放在事先约定的秘密掩蔽点，如朽树窟窿、破砖墙洞、麦秸垛里等等，然后在不远的地方隐藏好，等对方换完信件走了以后，便立即取出信件返回。有时是单独行动，有时是联合行动，有时遇到夜间没有送到时必须白天转递的紧急信件，便采取各种方式（如装作走亲戚、挑菜赶集等等）传递，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另外，武交队的同志们根据夜间活动的规律，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夜行经验：每逢横过公路时，先在路边侧耳静听，便能听到二、三里地内有无脚步声。如有“咔咔”的声音便是日寇，如有“跼跼、跼跼”的声音便是伪军，路过树林、坟地时，“哗哗”的声音是风刮树叶，“扑啦、扑啦”的声音是乌鸦扑打翅膀，“唰唰”的声音一般是獾、兔子、狐狸等在行走。冬天多刮西北风，春天多刮西南风，雪是向阳的一面容易化，坟地的碑文一般面向南，树皮的向阳面和背阴面也